



# 水中红莲 树上白荷

阎晓明

与莲花的最初结识,是从一帧照片和一幅画开始的。读小学的前一年,母亲从武清妇联调至天津市区一单位工作,一家人总算团聚。看她整理带回的书本时,一张她穿裙子的照片滑落出来。从未见母亲穿过裙子,我便好奇地捡起来递回她手中。“这是你四岁那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时照的。”可能知道我不会仅满足“党校”这个新鲜词,母亲又说,“这是保定莲花池。”我当然还是不满意:“莲花?”她思忖着从本子中抽出一张折叠的薄纸,展开来是一幅彩色的画:“这就是莲花。”她指着胖娃娃身边和手中的花朵,又依次点着画幅上边的四个字,“莲年有余”,是画的名字。小孩怀里抱的,是一条大鱼。有莲有鱼,意思就是“一年连着一年的富余”。等你明年上学,老师就教了。”画上的莲花,看上去很大,呈现出特别鲜艳的粉红色。莲花果真是这个样子吗?哪里才能看到真的莲花呢?时隔不久,父亲不知从哪儿搞来一片碧绿的鲜荷叶,说这就是莲花的叶子。他将荷叶像锅盖那样覆在刚熬好的一锅稀饭上:“我请大家喝‘荷叶粥’!”揭开荷叶,竟是一锅绿色。荷叶的古怪用途,更增加了我对莲花的好奇与赏花的期盼。

见到真的莲与荷,是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了。暑假中,学习小组的同学在我家写完当天作业后,就结伴前往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和八里台冰窖一带去捉蜻蜓,捞蝌蚪,采狗尾草。当时(上世纪60年代初)那些地方近郊野,水草茂密,昆虫众多,尤其是红色、灰色、绿色、黑色等不同体色的蜻蜓,让我们很感兴趣,那些日子里我们游兴盎然,视野大开。真的荷花、活的莲花就是那时闯入我的视线的。本来慕名想去天大青年湖游泳,但我们都没有泳裤,不好意思全裸下水,就闲逛到了南开大学马蹄湖边。从远处看,湖中好像布满了年画《莲年有余》上的那种花,但因从未见过,我不敢贸然确认,屏住呼吸走到近前,终于兴奋异常地喊了出来:“荷花!真是荷花!”小伙伴们惊讶地瞪着我:“没见过荷花?”我同样诧异:“你们在哪儿见过?”“水上公园啊!上学期学校组织游园你没去?”“那次我请病假了。”“那你快好好看看吧!”虽然他们想玩儿的地方还很多,却都乐意陪我看一会儿。湖中的荷花并不像画中那般孤傲理性,那般与其寓意一板一眼,丝丝入扣地对应,而是将一片片荷叶密密匝匝地簇拥为一个碧绿的整体;一枝枝红莲高高擎起,在夏风中自由奔放地摇曳,活力四射地舞蹈。后来在语文课上学习孙犁先生的《荷花淀》,读到“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心中所想的正是那次初见荷塘的意象。

从那以后,每逢暑假,我至少要到马蹄湖看一次荷花,直至上初二时远赴河西走廓拓荒大漠。25年后从甘肃调回天津,工作单位恰在天大、南大对面,有了赏荷马蹄湖的便利,工作再忙也会偷闲去看看荷花。搬家至人民公园附近,每到荷花盛开时,就会来到公园的环形河边,用相机拍下绿荷红莲。调北京工作后,又会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玉带河畔,观赏



荷花



广玉兰

汉白玉石阶下,与太庙那红墙黄瓦古建筑相映成趣的田田荷叶,朵朵莲花。

旅居江南城市嘉兴后,我又邂逅了一种与水中红莲截然不同的“树上荷花”。两种荷花的形状和大小几乎相同,不过水中莲花既有红色也有白色,树上荷花却全然洁白如玉。与树上荷花的奇遇发生在一个初夏,每日晨起散步的我,刚出单元门就看到一个奇怪的场景:对面那棵高大的树上,一夜之间竟悄然开出了许多酷似荷莲的硕大白花,非但从未见过,甚至也没在书本里读过。广播中听过,所以觉得格外神奇。问过当地人,方知此树名为“广玉兰”,也叫“荷花玉兰”。

说水中莲与树上荷截然不同,是因为各属完全不同的两类植物。水中莲是莲科莲属的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树上荷则是木兰科木兰属的常绿乔木。它们还有着属于各自的奇妙身世。荷花的前世可追溯到极为遥远的白垩纪晚期,那是距今一亿多年前恐龙种类空前丰富的时期,也是被子植物即开花植物逐渐取代裸子植物而兴起的时期,被子植物的繁盛为植食性恐龙提供了新的食物资源,推动了食性分化。莲,就是被子植物中较早出现的种类之一,有“活化石”之称,其分布以中国为中心,广见于亚洲

各地及大洋洲北部。在我国,古莲子沉睡千年再发芽的奇迹并不罕见。1952年,我国科研人员在大连普兰店采集到约500粒古莲子,经测定,这批古莲子埋在泥炭层中已埋藏千年,其中5粒于1953年被送至北京,后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培育开出花朵。2008年,精心挑选出来的一批普兰店古莲子搭载“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开展航天育种实验。2022年,广西南宁植物园在获赠普兰店3粒古莲子后,成功萌发其中两粒,于2024年5月31日开花,一时成为热点新闻。普兰店古莲子的神奇故事曾令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惊叹不已,他在《科学大众》1962年8月号上发表诗作《古莲绽新花》,情不自禁地高吟:“一千多年前的古莲子呀,埋在普兰店的泥土下。尽管别的杂草已经变成泥炭,古莲子的果皮也已经硬化,但只要你稍稍砸破了它,种在水池里依然迸芽开花。”

广玉兰同样是与白垩纪恐龙共舞的古老树种,其所属木兰科被认为是被子植物中较古老的类群之一,而它又是木兰科中较为原始的成员,至今还保留着诸多原始特征。不过,虽同样历经沧海桑田,水中莲却实属神州大地土生土长的“嫡亲宠儿”,广玉兰则是作为“海外奇树”漂洋过海而来的“北美移民”。广玉兰原产北美洲东南部,大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引入中国。据传,最早移居中国的广玉兰是随着远洋商船的颠簸落脚广州得以引种栽培的,所以得名“广玉兰”。又传晚清时李鸿章请求慈禧太后将108株广玉兰树种赏赐给淮军将士植于家乡安徽合肥;1984年,合肥将广玉兰正式定为市树。另有文献显示,广玉兰引入中国后,又名“洋玉兰”,南方沿海沿江城市为主要引种试点。广玉兰在南方城市的迅速推广,与江南士绅阶层的审美认同不无关系,民国初期许多私家园林都将广玉兰作为“新式雅趣”栽植。由于广玉兰观赏价值高,抗污染能力强,如今已在南方多个城市作为行道树、庭荫树和景观树广泛种植。

5月,旅居江南的我常去街边观赏广玉兰花开与否。花虽未开,花蕾已布满枝头,朝天竖起的一根根奶白色小棒,其长度与成花后的直径差不多。细观,顶端是尖的,披了些绢毛,酷似毛笔之锋,由此想到那个以“桃花流水鳜鱼肥”和盛产湖笔而出名的地方,对于湖州笔和树上笔的相似与密集,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看到广玉兰这小小的花蕾,不禁忆起小荷初露时那密布水面的幼叶。一次去南开大学老图书馆,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节,马蹄湖上冒出水来的尖角不多,大都是紧贴水面的绿紫色小叶。叶面上浮动着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随着云霞与阳光的交映变幻,小水珠们折射着千变万化的光泽。水珠从哪里来,荷塘之水可以跳上小荷叶吗?为什么会聚水成珠,而不是散为水渍一片?凝视小荷叶上那滚动自如的水珠,不禁对大自然的神妙感慨万千。即使在没有开花的时候,水中红莲与树上白荷,也都有着供我们观赏的资质和景致呢!

资料显示,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种植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初,是南开大学建校初期的重要景观之一。如果是这样,1923年暑假,前来参加南开大学暑期学校学习的邓颖超,也该观赏到这池美丽的荷花了。南开大学创办之初,经费紧张,校长张伯苓面对办学捐款来源的诘问时,讲了一句:“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是否与马蹄湖的荷塘与《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的传世名句息息相关呢?叶嘉莹先生的诗作“结绿川载在南开,有荷花唤我来”,也是在抒咏马蹄湖荷花的魅力吧!  
图题摄影:王炎

从1990年代初期以降,以余秋雨《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形成了一种以历史钩沉、文明叩问与士人心史为经纬的写作风格,并且影响深远。此类作品往往以肃穆的面孔,携带着颇为沉重的历史使命感与文化忧思,行旅间多有兴废感喟、人文反思的“苦”味。姜明的散文集《八千年的凝视》(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提供了另一种鲜明的审美向度与写作姿态。全书以巴蜀大地为舞台,以汉字、草堂、蜀道、苏东坡、薛涛、三星堆等核心文化符号为经纬,构建了一场从容愉悦、深情而睿智的“文化乐游”或者说“文化悦行”。他没有采用“居高临下”的宏大史观与悲情叙事,而是以观者之行、文人之眼、学者之思的交叠,深入所生活地方的文化肌理,在个体生命经验与文化记忆的互动中,形成了对巴蜀文脉的沉浸式游观、创造性凝视与美学的重构创造。

《苏东坡的家国》虽追溯东坡一生宦游,但其锚点始终系于眉山三苏祠。姜明不惜以大量笔墨细写祠中的银杏、黄桷、古井、木假山、荔枝树根化石以及楹联碑刻,这些风物不仅是背景,更是与苏轼精神对话的媒介。通过对“三棵树”“并蒂丹荔”等物的解读,苏氏父子的家风、文脉与命运以一种可触可感的方式呈现。他穿插自己与老师、友人游访三苏祠的往事,将个人成长、师友情谊与对东坡的理解融为一体。地方性知识在这里,首先表现为对“此地”风物的精微体察,继而升华为通过“此身”经历与“此心”感悟,实现对文化巨人精神世界的贴近与共鸣。

这种以“我”之所在、所历、所感为方法的地方叙事,使得全书避免了平庸的文史散文常见的导游图式陈列或教科书式解说。无论

## 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的文学表达

——评散文集《八千年的凝视》

刘大先

与许多文化散文将地方视为诠释宏大历史的注脚不同,姜明在《八千年的凝视》中则是将地方性小传统作为其认知与书写的方法。这里的“小传统”,并非指人类学意义上的底层文化传统,或者价值上的“小”,而是指其扎根于具体地域、日常生活与个人生命体验的书写路径。姜明不是以抽离的、全景式的视角俯瞰巴蜀文明,而是以其三十余年在川生活的轨迹为线索,将宏大的文化符号逐一内化为个人生命地理的坐标。

最典型的莫过于《我的草堂》:草堂不仅是属于杜甫的、国家的、民族的文物古迹,更是“我的”。这种归属源于作者与草堂长达数十年的生命交织——工作单位在草堂对面,第一个家安在草堂边上,人生重要抉择在此萌芽,乃至最终安居之处仍与草堂遥遥相望。草堂的雪、竹、碑,不仅仅是杜甫诗中的意象,更是作者青春记忆的载体、中年心境的映照与精神归宿的象征。他写1992年与同事在草堂雪中狂欢,写蜗居时遥望草堂获得的慰藉,写搬家后才发现自家阳台竟能望见“窗含西岭”的景致,顿悟自己始终“生活在杜甫的阴泽之下”。这种写法,将杜甫与草堂从凝固的圣像中解放出来,植回成都的街巷、气候与市井生活中,文化传承因而呈现出一种亦诗亦邻

是写薛涛与望江楼的梅花、竹影,还是写三星堆引发的震撼与困惑,作者始终在场,其视角是平视的、交融的、体验性的。文化不再是外在于生命的元素,而是内化于呼吸之间的血脉,从而让历史文化拥有了个体的温度与细节的丰盈。

如同标题所显示的,《八千年的凝视》的核心动作在于“凝视”。这并非被动、静观的看,而是一种主动的、充满对话欲望的文化激活行为。在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特展上,作者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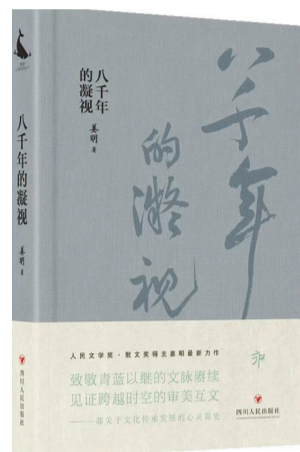
贾湖遗址龟甲上一只“八千年前的眼睛”相遇并对视。这一极具象征性的场景,显示了姜明处理文化记忆的方式:穿越时光的隔阂,寻求与先民精神的直接照面与对话。“凝视”意味着深度的解读与情感的投注。面对甲骨文、金文、秦诏版、兰亭序、颜勤礼碑,作者不止于介绍其考古与艺术价值,更致力于揣摩书写者当时的心境;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时的“惊喜而仁慈”,颜真卿书写时的“恭虔之心”,苏轼暮年书写《柳州罗池庙碑》时向柳宗元“学习做贬臣”的自我确认。通过这种同情之理解,冰冷的文物被还原为有温度的生命瞬间,历史记忆从而被激活,成为可与当代人灵魂共振的精神资源。

这种激活导向“创生”——文化记忆不是原封不动的复现,而是在当代语境下的再阐释与再创造。在《为什么人人都爱苏东坡?》中,姜明不仅罗列东坡的才华与事迹,更以现代人的心理解析其乐天人格、生活情趣与逆境中的智慧,最终提炼出东坡作为“中国好男人”的形象。这使得苏东坡脱离了单纯的文学史范畴,成为某种蕴含安顿身心意味的人格典范。同样,写薛涛,他既同情其情路坎坷,更着力彰显其作为发明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的独立价值与成就,完成了对这位唐代才女形象的现代重塑与价值升华。

对三星堆的书写尤为典型。作者坦言三星堆是其“心魔”,因其“超越人类想象力”的神秘性构成了理解的障碍。然而,他并未陷入不可知论的玄谈,而是试图以“美神”“艺术宝藏”的视角对其进行审美转化,赞叹其“嚣张”之美学、野性的文明,甚至将其与莫高窟、现代主义艺术相类比。他提出“三星堆时间”这一说法,将青铜神树解读为古蜀人宇宙观与时间观的物质凝结。这种解读未必是考古学的定论,却是文学性的创造,以一种考古学想象力的方式,将三星堆从扑朔迷离的考古谜题,转化为可被感知、可引发沉思的意象。

这部长篇散文集因此不仅是一次对巴蜀文化的回望,更是一本关于如何与自身文化传统相处、如何从中获得生命滋养的当代启示。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遗产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跟着《红楼梦》学写作(七)

## 曹雪芹隐身

宋安娜

花一木,莫不着意观览”的众人之眼来叙述。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是何等重要的场合,是全书聚集人物最多、仪式感最隆重的部分,作者也不站出来讲述,偏偏通过宝琴的眼睛来看。“且说宝琴是初次,一面细细留神打谅这宗祠”,从建筑到匾额,从对联到香烛,从神主到祭祀程序,从谁来主祭、谁来陪祭,谁来献爵到如何奏乐、如何拜兴、如何焚帛,宝琴目光所及,一一展陈于读者面前。

曹雪芹不仅习惯在重大场景叙述处隐身,许多细枝末节处他也“习惯性”隐身。第四十九回大雪下了一天,槐翠庵的梅花开了,曹雪芹通过宝玉的感知来表现——宝玉“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第五十九回“柳叶渚边嗔莺叱燕”写春天来了,大地回暖,万物复苏,多少景致,曹雪芹本可以尽情铺陈笔墨,他却将这任务推给宝钗,由宝钗的目光所及来展现:“一日清晓,宝钗春困已醒,睡下榻,微微觉寒,启户视之,见园中土润苔青,原来五更时落了点微雨。”

曹雪芹的隐身使其“丝滑”,视角过渡不留丝毫痕迹,读者不知不觉被他引领。仍以“林黛玉



夏山晓晴(中国画) 郭海青

# 满庭芳

第五四九期

《红楼梦》有个有趣的现象,曹雪芹写着写着就隐身了,让我们常常看不见他。

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曹雪芹写道:“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苴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此后,他继续以第三人称叙述,讲刘姥姥怎么来,怎么寻周瑞家的,待刘姥姥进了荣国府,进了王熙凤的院子,忽然就以刘姥姥的视角来描述了:“上了正房台矶,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满屋中之物都耀眼光彩的,使人头昏目眩。刘姥姥此时惟点头唯念佛而已。”此后很大篇幅都是刘姥姥的所闻所见,曹雪芹隐身了。

《红楼梦》中曹雪芹隐身的现象比比皆是。第三回“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本是第一次详尽描述荣国府建筑、陈设、气势的机会,之后的所有情节都将以此为背景展开,对于全书至关重要,但作者却通过黛玉目之所见来展开描述。大观园为元妃省亲建造,它的极度奢华,不仅是贾府钟鸣鼎食生活的极致体现,也是这个权贵家族逐步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这样关键的文字,作者却不露面,而是在第十七回至十八回中,通过贾政率领众清客和宝玉“一山一石,一

我出生于山西吕梁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因为山高沟深路远,新中国成立初期,山村许多年都没有小学。我九岁那年,突然意识到要想走出大山,就必须得读书。于是,在我的哭闹之下,父母只得把我送到山下数十里外的外婆家上学。

记得上小学的头一天,我望着教室外面高粱地刚刚泛红的沉甸甸的高粱穗,心里也产生了一种沉甸甸的收获感。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我破天荒地进了学堂,能不感到自豪吗?但我心里总是怯怯的,觉得山里娃与平川娃相比仿佛矮人一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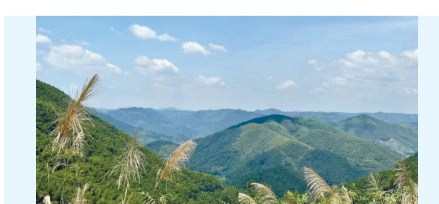
我正在遐想中,突然听到王老师在喊我的名字。我慌忙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在咧!”王老师显然是生气了,大声说:“什么?我在咧?”我在点名呢,你应该喊“到!”接着,王老师又重重地喊了一声:“武宝生!”我怯怯地应了一声:“到。”王老师盯着我:“以后要大声应‘到!’听下了。”我哆嗦着回答:“听,听下了。”王老师再次盯了我一下:“怕什么?男子

## 在吕梁山顶喊声“到”

武宝生

汉,就得地动山摇大声喊出来!回家,站在吕梁山顶,喊山去!”

“男子汉,就得地动山摇大声喊出来!回家,站在吕梁山顶,喊山去!”王老师的话在我耳旁回响。顿时,我有点羞愧。后来听人说,王老师也是山里人,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地区师范学院,成为一名深受当地群众敬重的小学教师。与王老师相比,我真的感觉自己矮了一截儿,责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山里娃那种粗犷和豪放的性格?星期日,我爬上村西的山顶,挺胸望远,这是文水和交城一带最高的山顶。我站在山顶的岩石上,按照王老师的嘱咐,深吸一口气,面对四周的大山高声练着喊“到”。



“到!到!到!”我大声喊了起来。而后,我听到了大山的阵阵回音:“到!到!到!”回音很响,很长,很久,充满力量。我突然觉得,自己也可以大声喊“到”啊!我浑身热血沸腾,仿佛家乡的大山给了我自信和勇气。我鼓足力量,连连喊“到”,回音不断,传向远方。这回音,仿佛不是喊给老师听的,而是喊给整个吕梁山听的!后来,我喊“到”的声音是全班最响最脆的。于是,我在点名的高声应“到”声中,考上了全省重点中学,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成为吕梁山区第一个走出大山的大学生,我的名字出现在我们地区的报纸上。

大学毕业到我部队工作,每当点名时,我的喊“到”声依然如前那么响亮。高声喊“到”的意识渗透

进我的心灵。“到”转化为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能量,让我自信和独立。每当需要出现在一个场所,我总是分秒不差地“到”。我“到”了,一般情况下,必定显示自己的存在,并充分彰显自己存在的必要和价值。

退休后闲来无事,常常想起上学时被点名喊“到”的情景。于是,我多次回到生我养我的吕梁山区,追忆与重温那久违了的“到”的回音。

那天,我再次爬上村西的山顶,情不自禁地面对大山高喊:“吕梁山,我到了!请您看看,我这个头发和眉毛都已发白了的人,此生,努力活出了真正的自我!因为,我在无限的求真求美的人生旅途中,不断地向您喊‘到!’”

面对大山,我把喊“到”之声提高了八度!大山不住地回应着我:“到!到!到……”

“到”,成为我一生的非常感受,变作一种推动我不断前行的力量。我站在吕梁山顶西望,只见夕阳的玫瑰色光正在西边天际书写落日的地。远方的黄河之水,带着我的喊声之日奔向大海。我触景生情,不禁感叹,即使哪一天自己跨入天堂之门,也要坦然而大声地喊一声:“到!”